老旗手

王妙瑞

他姓齐，年轻时在大游行队伍里举过红旗。那时我小他八九岁，同住虹口的一条弄堂里。他人高马大，走路身板笔挺。我看过1959年新闻纪录片的阅兵镜头，觉得大齐应该去参军，运道好的话被选中参加阅兵，还能上电影呢。大齐说这是做梦。能手持红旗参加大游行，在马路上走一圈也够自豪了。

老弄堂地处周家嘴路，是虹口的一条大马路，当年游行队伍必经之路。由工人为主，包括部分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规模很大，长龙似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尾，其中有不少我熟悉的工厂。如父亲上班的新光内衣厂，该厂生产的新光牌衬衫，周总理都称好。上海自行车厂生产名贵“私家车”——永久、凤凰自行车。上海缝纫机厂制造千家万户期盼“蜜蜂”进屋的缝纫机。上海解放塑料制品厂的塑料雨衣堪称当年的“阿玛尼”品牌。该厂为刘少奇访问印尼，赶制过作为国礼的塑料雨衣呢。弄堂隔壁第五机床厂的摇臂钻床出口日本。安国路口的上海跃进电机厂生产的马达质量国内一流。这些工厂离我老弄堂都很近。大齐所在的厂是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争气厂，产品保密。各家工厂在游行中展示自己的产品模型，做得非常精美逼真，有的还会转动。队伍中有扛横幅标语和宣传画的，一幅“赶英超美”的宣传漫画太大，放在卡车上展示，旁边还有敲锣鼓的，非常振奋人心。领头的游行仪仗队，穿着白色制服，精气神十足。接下来是红旗方队，大齐是这个方队中的成员，第一排的标兵。旗杆高3米多，几十面红旗迎风招展很有气势。

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游行前一天的夜里，大齐突然胃痛得厉害。我家是红十字卫生站设的一个点，医药箱里有常用药品。大齐要了几片胃药。我母亲问他明天大游行依吃得消吗？大齐说他是红旗手，撑也要撑到游行结束。第二天一早，沿马路人行道挤满了人群，挡住了我们小人，我回家扛了一条长板凳放在最后面，几个弟弟一起站上去等候队伍的到来。我特别关心大齐能不能挺得住，并找出了一根自己戴过的红领巾，准备向大齐示意致敬。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大杨浦方向开过来，朝市中心方向行进。大齐在方队里高举红旗，走步有力。我拼命向他挥舞红领巾。游行结束后，大齐回到弄堂告诉我，他看见了很受鼓舞。这段经历对他、对我来说都难以忘怀，铭刻于心。

1969年，我当兵去了，1978年10月，复员回到上海工作，送了一件新军装给大齐，因为当年的绿军装非常吃香，深受年轻人和中年人的青睐。大齐的从军梦没有实现过，穿上了军装非常开心。我还送了一副红领章给他。虽然不能佩戴，但很有纪念意义。有一出京戏里唱道“革命的红旗挂两边”。这“红旗”指的就是红领章。大齐说，记得、记得。我说部队里的旗手是最勇敢的战士。你当过工人旗手也很坚强，是我小时候的崇拜对象。送你红领章就是这个意思。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人生之旅就是选择之旅。

2000年前，老齐退休了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是社区志愿者，常在马路边维持交通秩序。当年举大红旗，现今持小红旗。我觉得老齐身上有一种担当精神和奉献精神。他一日持旗，一生爱旗；遂成信仰，终身不变。我知道他当工人几十年，积极参加劳动竞赛，夺得过很多次优胜红旗。我感悟一个平凡的人，心里一直有红旗意识，永不落后地活着也很好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老齐也有80岁了。我买了一面小型五星红旗送给他，因为他是一个老旗手。这是他的最爱，我深知。

大钟诞生记

张敏余

七十载岁月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国家建设突飞猛进。我们这一代是亲历者，也是建设参与者。

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，北京搞“十大工程”（包括人民大会堂等）时，在天安门广场上繁忙紧张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，依然历历在目。工人们夜以继日，抢时间，赶进度，只为了能让世界看到首都的新面孔。其中一项是北京火车站。车站是民族形式，十分美丽壮观。有两只塔钟（直径六米）高高地矗立在顶上，十分显眼。大钟的任务落到了上海倍高钟厂。这是一个八百人的公私合营小厂，生产的钟既不是电钟也不是时钟，而是“子母钟”：两只塔钟和月台上几十只钟都是子钟，由母钟控制，每分钟走一格，所有钟完全统一。我当时28岁，是公方厂长。1959年1月，上海钟表公司领导叫我带一位技术工人蔡竹青同志去北京接任务。没有样子，只有大钟的尺寸需求，要求钟面直径六米，八个面，走时统一。这样大的钟，厂里从未生产过。在回沪的火车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压力之大无法想象。回厂后向工人们传达这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，大家群情激昂，摩拳擦掌，表示一定要为国争光。

我们首先参观了上海三只大钟，尤其是外滩的海关大钟，机芯巨大，特别是报点报刻的钟是浇铸出来的，但当时我国无此技术，只能另想办法。经过充分研究讨论，成立了几个攻关组：由蔡竹青同志负责总设计和定时传动机械系统，何元明等同志负责母钟控制台，周根寿等同志负责报时报刻问题。又请上海音乐学院协助研制和调试，最后创制了“钟声发生器”，还能唱“东方红”乐曲，用磁振荡把声音扩出去，比西方浇铸的钟要省时省力，轻巧精致实用，真是一种创新。钟面的“字”，用乳白玻璃，也请有关单位协作。

经过全厂职工日夜奋战，终于在九月初完成。北京铁路局专门派了一节车厢来装大钟零部件，我和有关职工随车第二次上北京去安装。同志们夜以继日安装调试，经过半个月的努力，终于完成。当车站上空响起报时报刻和“东方红”乐曲时，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们无不欢呼雀跃！北京铁路局领导对我说：“你们厂小志气大，不愧为上海工人阶级。”

后我厂被评为上海市先进企业之一，蔡竹青同志评为工程师。

眼睛的后面是大脑

杨斌

那天走在路上，也不知为了什么，忽然对自己的眼睛产生了不满：为什么你们能看清别人的相貌，却只能看见主人我的手和脚、胸和腹，看不见脸和背？

回到家中，镜子也只能照见前半身。想看看自己走路的样子，一动脚步，又出了镜框。仔细打量镜子里的眼睛：你俩虽然是个球体，但是呆在眼眶里，活像两个藏身于碉堡的士兵，躲在里面能看别人，却看不清主人。如果没有镜子，我连自己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！难怪人们常叹“人贵有自知之明”。

可是造物主这么安排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谁说得清？我在沙发上坐下，闷闷不乐地合上了眼皮。

眼睛的后面是大脑。关上了前面的心灵之窗，却打开了隐藏其后的脑洞，从那里跑出许许多多念头，一如花果山上的猴子，活蹦乱跳：

——眼是人的五官之首，如果没有它们，你如何读书写字，行路为人？又怎么观赏大自然的五彩缤纷，见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？它们为你积劳成疾，年轻时近视，年老了变花，后来还得了白内障。你应感恩而非埋怨！

——看清自己的灵魂比看清前脸后背更重要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只能靠我们大脑，靠大脑的省思。脑和眼的关系，一如手和腿，心和肺，肠和胃，相辅相成。可笑的是，你们常常把大脑的功劳归之于眼睛，什么“目光远大”、“高瞻远瞩”啦，什么“火眼金睛”、“眼光独到”啦，其实哪样不是我们大脑凝想深思的结果？

——战国时的邹忌之所以能看出城北徐公比自己美，察觉出妻妾和访客对自己的恭维，是因为他有脑子；陈寅恪晚年在双目失明的状况下，仍能著书立说，靠的也是脑子；海伦·凯勒失明又失聪，竟能掌握五种语言、出版十四本著作，还是因为她有一个管用的大脑！

——我们大脑还能调整眼睛的焦点呢！鲁迅就举过例子，同是一部《红楼梦》，“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”

这些念头倏来忽往，速度之快有如电光石火。我虽是大脑的主人，这时却成了一个笨拙的驯兽师，控制不了这些心猿意马。

突然，耳边响起一声“开始清扫”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脚边的扁圆形扫地机器人定时启动了。刚才脑子里的那些念头顷刻散去，注意力随即转移到眼前这个小家伙身上。只见它灵活地在桌椅腿脚之间穿梭，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，极其耐心地清扫每一寸地面。看来，机器有了眼（感应器），有了脑（载有程序的芯片），再加上各种形状的手和脚，就可以在某些领域替代人的工作，而且常常可以比人做得更好！

边看边聊

关于“高级饼”

郑自华

前不久，读到吕庆在晚报上写了篇《外婆的“石头月饼”》，文章情真意切，十分感人。我将文章转发到朋友圈以后，引起了大家的共鸣，但也有朋友对文章提到的月饼价格表示了质疑。文中说：“那天（备注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），我到南京西路王家沙左挑右挑，花了4元5角钱买了一只皮色油亮、印戳鲜红的苏式百果月饼。”我长期在烟糖公司工作，很多老同事发信息给我，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商店供应的广式百果月饼也只要0.29元/只，金腿0.31/只。还有人说，四五十年过去了，即使现在，4.50元也可以买上月饼了。所以都认为文章有误。

其实，作者的记忆一点没错。在三年困难时期，上海商业部门发放的票证多达53种，141个票面，一个季度发的票证有厚厚一沓，所有的票证中，粮票最为重要，没有粮票，有钱都买不到粮食。我家有6个兄妹，最大的18岁，最小的4岁，定粮根本不够吃，但有段时间，我们每个月有一次享受“特殊”待遇——母亲会到平凉路宁国路的合作社（后来合并到烟糖公司）去买“高级饼”，0.50元1块，不要粮票。一般情况下，这块饼只要5分钱，但需半两粮票。也就是说，此类不需粮票的特殊售卖饼，价格是正常的10倍。母亲每次买6块给我们，她自己不吃。每次吃高级饼，家里就像过节一样，一块比茶杯口还小的饼要吃上半天，然后再回味半天。可惜的是，这个“政策”实行了一年不到就取消了——因为家中没钱了。所以吕文中说花4.50元买高级月饼是符合实际的。

为了佐证，我特地查阅了有关资料。1961年1月19日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提出：“现在供应紧张，应该‘两条腿走路’，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，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。”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，是从高级糕点、糖果开始的，然后扩大到饭馆、商店等许多方面。实行结果，全年销售高价糖果4.1亿斤，糕点3.9亿斤，共回笼货币33亿元。

从当年没有什么可吃的，到现在想吃什么有什么，这是多么大、多么好的变化啊！

轮廓

刘海民

老韩参加初中同学的聚会，拍了张照片，说你看看是不是老陈？老韩不认得老陈，老陈与老韩同届不同班。但老陈与我相熟，老韩只在我那见过一回老陈的照片。

一看，还真是老陈。

照片是张剪影，看演出时照的。台上有人在唱歌，老陈在台下拍观众。台上显然很亮，台上很亮的灯光给老陈作了背景。两天前，就剪影还与喜欢照相的老韩有过讨论。我说，剪影要看得出人来，无非要有两个条件，一是前景人物并没全黑、多少还能够辨认；第二就是人的轮廓线有特点，一看就能对上号。我说，你拍的老陈，属于第一种。

照片说到轮廓，突然觉得轮廓有意思。

轮廓是什么？轮廓是一个物像大体的形。上小学常用轮廓造句，比如：远山的轮廓在雨雾的遮掩下显得有些模糊；再比如：事情比较复杂，我先说说它的轮廓。轮廓语出《后汉书·董卓传》：“又线无轮廓文章，不便人用。”

现在的电影，面市前都会先做个片花，就是给你一个大致的轮廓。轮廓就是提纲挈领的短故事。画画的讲轮廓线，轮廓线找准，画就大致有了形。拍照的讲究轮廓光，轮廓光是直对镜头射过来的逆光，这光一打，人的轮廓就有了，画面层次就有了变化。

轮廓如今还用到了客户分析里面，甚至上升到了市场营销战略。对客户或准客户的特征和行为方式进行勾勒，对分类档次、风险、爱好习惯等都逐一地进行分析研究，再有针对性地做出方案。轮廓分析的概念，大概最早还是来自犯罪心理学对犯罪嫌疑人的勾勒性揣测和分析。

轮廓有时也会让人生怕。有个朋友去医院拍了张片子，说医生写的看不懂，便拿与我看。上面清楚地写着：胆囊底部轮廓欠清，底部壁上见结节高回音附着。其实我也看不懂，但觉得这样写轮廓，轮廓就一定是出了问题，也不敢说，推说也看不明白，你还是得去问医生。

人上了年纪，苦恼事情记不清，其实就没必要记。臧克家那年来家里找父亲玩，正酝酿着一首诗。记得诗中有两句：我愿把心室化作两间，一间盛痛苦，一间盛欢乐。我想，那就只盛欢乐吧，还得挑肥拣瘦，只盛一个轮廓。

邮票的特别故事

冯联清

七夕会

翻开厚厚的邮册，琳琅满目的“邮海”中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邮票始终是最夺人眼球的，不仅大气美丽，而且最富“国家元素”。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“逢十”大庆，便是我竭力收集、细细观赏的最期盼的时刻。每每此时，一种爱国的情感，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就会油然而生。

说来奇怪，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枚邮票，竟然就是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第一组“纪67”的第一枚。尽管那时我只有5岁，我对眼前的一切还是懵懵懂懂，但我却从父亲手中看到了一枚浅咖啡色调的邮票。爸爸告诉我，这是才买的新邮票。我仔细端详着它：毛主席像亲切而慈祥。爸爸说，毛主席像下面的一条横贯邮票的红缎带，写的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”几个字，邮票的最下面是北京天安门。我看见，邮票中的天安门上飘着瑞云，使得“云上”的毛主席像显示出一个大国领袖的气度和风采。

记得我当时就向父亲要下了这枚原本要寄出去的邮票，开始了我的集邮生涯。然而要集齐这套十周年五组全部19枚邮票，却花去了我整整40年的时间。大凡集邮之人，对于邮票不成套的烦恼都会耿耿于怀，我也是这样。这五组邮票的最后一枚“纪71”《开国大典》的集齐，是2004年在杭州西湖边的一个邮票交换市场。那天上午天有点阴，我看见有许多人在交换邮票。我一眼就看见了“纪71”中红棕色背景、面值20分的信销邮票。一问价，竟然开价35元。尽管觉得有些贵，但我还是果断出手，将这枚望穿秋水的邮票收入囊中。

我先后集齐了中国邮政70年来发行的25套共142枚精美的专题邮。这些邮票中，既有闻名遐迩的十周年的《开国大典》，也有为30周年而发行的国歌邮票。尤其难得的是，我还有幸搜集到十分珍贵的1964年“三联票”！

这些邮票，随着我到农村插队，到企业拼体力，到机关拼脑力。每当工作遇到难题，每当思想苦闷的时候，我都会翻阅这些设计精美、立意高远的专题邮票。那庄严的五星红旗、国徽，那欢天喜地庆祝佳节的工农兵，那雄伟的天安门，都会让我沉醉其中，驱散了我的烦恼，增加了我克服困难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
不知不觉，从我5岁时获得的第一枚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邮票算起至今，这些特别的邮票已经随着我60年了！我还将它们作为一种益智型的收藏，向区域居民、学生和来沪人员进行宣传和展示。我的专题邮集还获得过冶金局邮票展览的特等奖。

这些特别的邮票，以方寸画幅浓缩了国家的经济、军事、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。把它们排列在一起，我惊奇地发现，这就是一幅浩气横贯的国家发展的历史长卷——70年的卓越奋进，70年的丰功伟绩，令人振奋！

雅玩